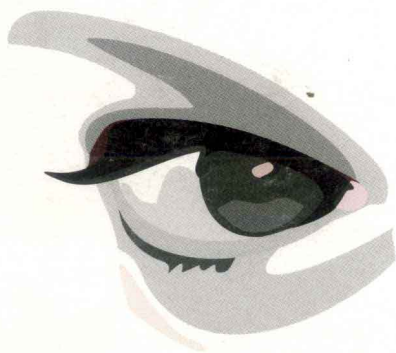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美] 默瑞·N. 罗斯巴德 / 著
张凤林 等 / 译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

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

——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

[美]默瑞·N. 罗斯巴德 著

张凤林 等译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
经济思想史. 第1卷/(美)罗斯巴德著;张凤林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ISBN 978-7-100-08847-3

I. ①亚… II. ①罗…②张… III. ①奥地利学派—
经济思想史—研究 IV. ①F09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8237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

——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

[美]默瑞·N. 罗斯巴德 著

张凤林 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847-3

2012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0

定价: 68.00元

© Murray N. Rothbard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ume I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根据爱德华·埃尔加出版有限公司 1995 年版译出

译者序

(一)

本书是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来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而且也是截至目前从这一视角来系统地审视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唯一一部通史性著作,故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似有必要简要地了解一下奥地利学派的梗概。经济学中所谓的奥地利学派,一般是指在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的浪潮中出现的一种以个人主观心理分析为特色的边际主义理论流派。它肇端于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71年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但只是一二十年后在其第二代学者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特别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那里才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经由米塞斯、哈耶克这样一些第三代学者的努力它更达到了巅峰状态,以至于当时经济学界曾有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洛桑学派“三足鼎立”之说。然而辉煌转瞬即逝,随着“凯恩斯主义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的到来奥地利学派逐渐地被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奥地利经济思想重又活跃起来,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复兴和扩展奥地利经济学传统。不过,不同学者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尽相同,比如:希克斯(J. R. Hicks)侧重于资本与时间结构理论,马克卢普(F. Machlup)强调社会自由的理念,沙克尔(G. L. S. Shackle)等强调不确定性,而一些美国新一代奥地利学者则努力拓展米塞斯、哈耶克关于市场是一种学习和发现信息过程的重要思想,批判新古典的均衡理论。与此同时,近些年来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且日益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实验经济学,据说也是体现了奥地利经济学的思想传统。由此看来,在当代的西方经济学界似乎已经不再有一种像门格尔时代那样严格意义上的“奥地利学派”了。然而,如果从理论“硬核”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独立的“奥地利学派”或经济学中的“奥地利范式”还是存在的。概要地说,这个硬核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强调个人决策是一种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市场活动作为人们学习和发现信息的过程不同于机械式的均衡状态;其二是,认为任何统一计划和国家干预(包括人为的制度设计)都不可能改进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而只能给市场添乱,因此主张实行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信奉或自我标榜为属于奥地利传统的人可能在各种具体问题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是他们对于这两个基本点却具有广泛的一致性。正是这两个理论基本点,使得奥地利学派不仅与当今作为主流学派的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形成了根本分歧,而且也明显地有别于其他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派。与上述基本的经济观相对应,许多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还持

有一种据说是源自约翰·洛克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的政治哲学观。这种观点强调个人自由和财产权作为自然权利的神圣性,并认为对这种权利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及其垄断。因此,他们便提出一些诸如完全的个人所有权、自由放任甚至自由市场货币、无政府或小政府的资本主义、不干预主义以及反对平等主义等等较为极端的政策主张。

如何客观地认识与中肯地评价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对此长期以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不同经济思想流派的长期并存本质上乃是社会经济运行具有复杂多样性的一种反映,他们相互之间在从不同视角来解析经济运行方面是具有互补性的,尽管不同的学派为了争夺主流正统的地位而不断相互竞争着。这意味着,每一个思想学派都有其特定的学术价值来值得我们研究和汲取。应当说,奥地利学派在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其对于现、当代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早期奥地利学派所开创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分配论(归与论)、机会成本思想、强调时间结构的资本—利息理论与周期理论等,构成了边际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建构功不可没。其次,在奥地利思想传统的熏陶下涌现出了一批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哈伯勒(G. Haberler)、摩根斯坦(O. Morgenstern)、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 Rodan)等人,甚至熊彼特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在内。这些人在众多的领域对现、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最后,当代的

奥地利学者基于其对于人类行为与市场过程的深刻洞察,揭示了社会经济活动天然具有的动态性、不稳定与不均衡性,这超越了单纯拘泥于机械式均衡的新古典理论模式,对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对于以均衡、数量、正规化分析等等为特征的主流经济学方法的批判,为如何促进经济学中现实主义的回归与健康发展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他们基于自然权利是经济繁荣的基础的理念,明确指出了对个人自由竞争的人为限制所可能带来的弊害,特别是对于集权和垄断的不良经济后果给予了深刻揭露和分析,这对于在现今的“混合经济”社会(包括经济转型国家)中时刻提醒人们警惕政府权力的不当使用甚至滥用也具有明显的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

当然,像所有其他的经济学流派一样,奥地利经济学也有其局限性。它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原理或观点也仅适用于特定的经济现象与环境,超出这种特定环境可能就失效了,故如果不注意这些特定条件,如果不加限制地盲目赋予这些原理以普遍性特征,则必然导致谬误。比如,虽然主观心理评价是决定价值的重要因素,但是这并不能否定生产成本也是决定价值的重要因素,二者在不同的条件下作用的相对强度是不同的。如果不加限制地强调主观心理评价始终是价值决定的唯一因素,就势必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再比如,虽然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效率上远远优于计划经济或集权经济体制并没有错,但是如果由此得出完全不需要宏观计划或政府的调控与干预措施就能够实现经济的稳定良好运行的结论,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当代的

许多奥地利学者在这方面具有一种极端化的倾向,他们往往从强调自然权利、个人自由、市场竞争走向了几乎完全否定政府干预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立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它相对于凯恩斯革命以来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潮流而言意味着某种倒退。由此可见,对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我们是有需要分析地来加以看待的。

(二)

本书作者默瑞·N. 罗斯巴德(1926—1995)是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当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移民家庭,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先后以优异成绩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约瑟夫·道夫曼。虽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为他打下了厚实的学术基础,但是对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最重要影响的还得说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位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巨匠。米塞斯 1949 年出版的《人类的行为》一书,系统阐述了奥地利学派的所谓“人类行为学”方法,这极大地吸引了罗斯巴德。他积极参加了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研讨班,并实际上成为米塞斯的重要弟子和追随者,终生致力于弘扬和发展奥地利经济思想传统。罗斯巴德在 1963 年至 1985 年间执教于纽约大学的工程技术学院,从 1986 年起任内华达大学的讲座教授,直至去世。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创立了自由意志论研究中心和《自由意志论研究杂志》(*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80 年

代初又参与创立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并担任副所长,随后又创立了《奥地利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现在名为《奥地利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罗斯巴德一生发表了几十部著作,上千篇文章。这些著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他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观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政治哲学观。本书是其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重新解读和梳理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著作,作者原先曾有宏大的三卷本写作计划,但是由于不幸逝世只完成了论前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前两卷,分别以第一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和第二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为题出版。

毋庸置疑,本书与以往流行的大多数经济思想史书籍的显著区别,首先就在于它的奥地利分析视角与思想倾向。我们知道,经济思想史记录了人类经济思想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虽然历史本身已经被“定格”在过去的某个时刻,但是对于历史的解读却似乎永远难以终结,这不仅仅是由于新的史料的发现会填补以往解释的空缺,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现代研究者基于当代的考虑以及个人的偏好往往热衷于不断从新的视角来对历史给予重新审视和解读。研究者的这种“主观侵入”(著名的奥地利物理学家、自然哲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薛定谔(1887—1961)的用语)既是史学的复杂之处,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本书就是基于当代的奥地利思想观点而对经济思想史进行重新阐释和解读的产物。作者对于古希腊、主要是亚里士多德以降直到19世纪中后期的经济思想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

理,从中着力发掘现代奥地利学派所崇尚的主观主义、效用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和演变脉络,旨在表明当代奥地利经济思想发展的长期历史传承性。与此同时,作者又试图彻底揭示以往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由于过分崇拜亚当·斯密及古典学派而造成的对历史的严重曲解和误读,及其对于当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负面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本书实际上按照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观点重新改写了整个经济思想史。由此也可以说,本书代表了当代奥地利学者在经济思想史领域复兴奥地利传统的一种努力。

正是基于上述立场,本书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流行的经济思想史解释的新观点。例如,作者指出,对经济思想史的仔细研究表明,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相反,亚当·斯密根本不是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而是导致经济学发展误入歧途的罪魁祸首。因为他的以成本分析为主导的古典体系中断了自亚里士多德至中世纪经院学者的需求与效用分析思想的潮流,使得经济学的发展在直到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革命再度兴起之前的两百年时间里,出现了暂时的曲折和倒退。这个见解确实有些惊世骇俗。再比如,作者指出,以往史学界流行的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基础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近代自由的市场经济普遍繁衍于天主教传统文化的国家,正是这种文化孕育了人们对效用和享乐的追求,它比起单纯强调节俭和辛劳的加尔文主义等新教信条来,更能够为市场交换与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从而,强调主观效用分析的奥地利经济思想就比强调劳动、供给分析的古典学派思想更为

深刻。此外,作者还强调指出,通常的思想史学家往往假定历史总是沿着直线上升的轨迹前进,从而后来的经济学家总是比先前的经济学家更高明。实际上这是一个严重的认识误区。经济思想史的诸多例子表明,人类对客观经济现象的认识过程是曲折的,在特定条件下出现暂时的,甚至长时间的倒退也是可能的。明确这一点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可以使人避免简单化的倾向,关注历史的复杂多样性。与此相联系,以往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颇为流行的以“大人物”为核心的模式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模式往往容易忽视许多所谓的“小人物”的学术贡献,丢掉历史的细节。而一旦这些细节得到了充分的挖掘,那么先前的历史也许需要重新改写了。作者的这些观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它们打破了以往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常规套路,很值得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深入地思考。

上述思想观点在本书的体例和内容结构上也得到了反映。与以往的大多数经济思想史著作相比,本书首先是涵盖的内容更全面,详细阐述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中后期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包括中国古代的若干经济思想),特别是对于被以往的著述所忽略或关注不够的历史事件比如中世纪经院学者的思想展开了深入的发掘与梳理,一些以往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被赋予了应有的历史地位。其次是分析的维度更宽泛,不仅细致地梳理不同学者与学派的经济思想,而且努力从他们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宗教与哲学思想等多个侧面来探究其经济思想的成因。由此,作者就以其渊博的历史知识

和丰富的洞察力为我们描绘了一部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经济思想史。这也是本书比起以往的同类著作来部头要大出许多的一个原因。

总起来看,本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在目前已有的众多经济思想史书籍中堪称别具一格。读者从本书中一方面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经济思想,另一方面还可以获得丰富的有关经济思想史的新资料、新阐释、新结论,这对于无论是从历史的纵断面,还是现实的横断面来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现代经济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笔者对于本书作者的观点完全赞同。实际上,本书作者的一些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有些则是明显错误的,比如,作者在论述集权体制的弊端时往往不加区别地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同政治体制下的政府行为混为一谈,显示出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态度。这显然是由其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立场和政治哲学观所使然。成熟的读者完全有能力以科学的态度对此加以辨析。

(三)

本书的翻译工作历时近四年。2007年5月,商务印书馆的朱泱先生向我推荐本书的英文版,并商讨翻译事宜。我在大致浏览了篇章结构及概要内容之后便把任务承接了下来,一则是因为此前跟商务有过愉快的合作,二来也是由于我本人乃是经济思想史专业出身,对此领域有一定的偏好。因此,尽管近年来

国内学术界在强调所谓“原创性”的呼声影响下对于学术翻译工作具有的“科研含量”的估价急剧下降了,我还是愿意把本书的翻译工作当作一项基本的学术建设工程来做。在我担当主译和负总责的情况下,也邀请了我先前曾经合作过的学生和同事,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军教授和东北财经大学商务外语学院的王兆刚讲师,来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力争为国内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学界献上一份有益的“精神食粮”。

思想史著作的翻译向来属于翻译行当里的“棘手活儿”,我对此是早已领教过的,但是真正开始翻译工作之后,我才感觉到本书翻译的难度和复杂程度比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它确实确实地属于那种更“难啃的活儿”一类。这里的难度不单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包括英语难句及非英语词语的解析问题),更多地是涉及早期的社会历史、政治、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记得2010年上半年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向经济系的教授请教此类问题时,他们也都拿捏不准。有时,为了确切地把握罗马教皇颁布的一部“教令”的含义和名称,我甚至在该校图书馆忙碌了大半天却无功而返。由于这种情况,也由于教学工作繁忙等原因,使得本书的翻译工作持续的时间较长。当然,面临困难和挑战是有意义的,知识的增进程度往往也是与知识获取难度呈比例的,从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无论在语言知识、专业知识还是历史文化等综合知识方面都大受裨益。

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第一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第6、7、8、9、10、11、12、13章由王军翻译,导言、致谢、第1、2、3、4、5、14、15、16、17章、索引表由我翻译,文献注释部分由我

们按照与正文对应的原则分别翻译;第二卷,《古典经济学》,第1、2、3、4、5、6、7章由王兆刚翻译,第8、9、10、11、12、13、14章以及导言、致谢和索引表由我翻译,文献注释部分分工原则与第一卷相同。在初译工作完成的基础上,我对全书两卷译稿又进行了仔细的修改、统校和定稿工作。

感谢商务印书馆朱泱先生对本书翻译工作给予的热情支持与鼓励。同时,本书的第二卷包含有若干段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引文,译者在对于这些引文进行翻译时适当地参考了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相关书籍,特此说明并致谢。最后,对于译文中出现的错误与疏漏之处,恳请学术界同行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张凤林

2011年7月12日

于大连黑石礁,东北财经大学烛光园

导 言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部根据明确的“奥地利的”立场,亦即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拥护者的观点而撰写的经济思想通史。它是由现代奥地利学者所完成的唯一一部此类著作,实际上,近几十年来,奥地利学者仅仅出版了少数几种有关思想史这一专门领域的专题论著。¹不仅如此,这种观点还是建立在“米塞斯学说”或“人类行为学”(praxeologic)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学说在当前已成为奥地利学派中最不时兴(虽然并不是人数最少)的一个演变分支。² vii

但是,本书的奥地利学派性质还不是它的唯一特色。当本书作者在20世纪40年代刚刚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压倒一切的、占支配地位的范式(这种范式在今天虽然仍占有首要地位,但是却不像那个时代那样赤裸裸地毫不掩饰了)。从本质上说,这种范式是将少数大人物描绘成经济思想史的本体,而将亚当·斯密奉为几乎是超人式的奠基者。但是,如果斯密真是经济分析和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传统的创立者的话,那么对于通常所宣称的他的成就的任何方面提出严肃的质疑就都将是不足道和无聊的了。对于不论是作为经济学家还是作为自由市场的鼓

吹者的斯密的任何尖锐批评看起来都只能被归结为时代错误：由于是从当今超级知识的视角去俯视作为先驱的奠基人，所以渺小的后继者们是在不公正地猛烈攻击着我们正站在其肩膀之上的巨人们。

如果是亚当·斯密创立了经济学，就像从宙斯的额头跃出已经生长成熟并且全副武装的雅典娜一样，那么他的前辈们就必然要成为陪衬，成为不被重视的小人物。从而在这些古典经济思想的人物中，凡是极其倒霉地处于斯密以前时期的人就都受到了漠视。他们一般地被归为两类人，并且都遭到了粗暴的遗弃。直接先于斯密的是重商主义者，他们曾受到斯密的猛烈批判。重商主义者是明显的大笨蛋，他们总是不断地敦促人们积累货币而不要花掉它，或者坚持主张对每个国家来说贸易的余额都必须“平衡”。经院学者被作为热衷于说教的中世纪的不学无术之人，遭到了甚至更加粗野的抛弃，这些人总是喋喋不休地告诫人们注意，“公平”价格必须能够补偿商人的生产成本外加一个合理的利润。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20 世纪 40 年代发表的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作品，接下来又详细阐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赞美斯密以后的少数顶尖人物。李嘉图使斯密学说系统化了，并且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始终在经济学中占有支配地位。继而是“边际主义者”，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他们通过强调与物品
viii 的全部等级相比较而言的边际单位的重要性，按照边际主义方式矫正了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随后又到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明智地将李嘉图的成本理论与被假定为一边